

蓝李军史料辨伪

王文才

清季蓝朝鼎、李永和为首的农民起义，扫荡川滇陕甘鄂豫六省，历时七年，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对清王朝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革命运动。由于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年代，戎马倥偬，文献缺乏。后世杂记传说，往往捕风捉影，臆造不实之词，遗留迄今，辗转引录，因讹成误，影响未除。兹就关系较大的几个问题，试为析疑，略见闻途说窜乱旧史，多不足信。

首先是蓝李军的政治纲领问题。

起义军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农民运动的传统思想，赋予不同的时代内容，曾提出“顺天灭满”的战斗口号。此事仅见于《斑城遇贼说》的记载，而实际体现在整个运动中，贯串始终，富有纲领意义。

“天”是历代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利益、巩固秩序的思想工具。两三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竭力鼓吹天道，总认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农民革命却反其道而行之，宣称天道应存于民心，起义是顺乎天意。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李自成号称“奉天倡义”，张献忠建元“天顺”，洪门高揭“顺天行道”的旗帜，久已成为革命的传统思想。蓝李军制定“顺天灭满”的口号，“灭满”虽带有旧的民族观念，却饱含着血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建立政权，历史经验证明，不彻底毁灭清王朝的整套统治机构，理想就会落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蓝李军的任务，必先摧毁清朝的统治。义军首领号为“蓝大顺”，虽领导易人，而称号不变；李永和自称“顺天王”，“僭号顺天”，自成一代政权。蓝大顺进入陕南后，改号“天汉显王”，玺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仍称其部队为“顺天兵”，服色尚黄，士卒都穿黄衣，正表示以“黄天”代替“苍天”。这都显示着一贯的政治主张，“顺天灭满”，始终不渝。

近年关于义军政治纲领的介绍，皆以永和驻师铁山观音阁的门联，作为主要依据材料。这付楹联，出自文人之手，得于传闻之词，字句大体相同，内容甚为混杂，未可一概而论。上联云：“旧主本仁慈，可恨贪官污吏，败坏二百余年基业”，语意颇为清朝惋惜。显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颂扬清帝是“慈仁”圣主，但因臣下不善，败坏了基业。只恨个别官吏，便没有推翻地主政权的必要，而起义也将成为解决贪官与人民矛盾的手段，局限很大。

固然，反抗封建统治，也包括对贪官污吏实行专政；蓝李首义的导火线，正因地方

官吏的勒索诬害而起。起义爆发于咸丰九年(1859)的秋天,在此以前,蓝李已组成护商组织,往来川滇,为对付关卡的重税苛求,暗中串连,互相帮助,开始冲破清朝的统治秩序。及到昭通地区的县吏汛官上下勾结,竟然对蓝李等人诈赋陷害,才激起反抗。起义爆发在川滇边境,这里是官僚地主土司恶霸盘踞之处,恣意横行,成为清政府所辖下最黑暗的角落之一。四川各个地区,也深受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的残酷压榨,矛盾激化,俟机待发。随着蓝李首义的声势,革命烽火很快就燃遍了两川,掀起波澜壮阔的斗争风暴。大军所到,无不严惩首恶。进入陕西定远时,蓝大顺还宣布过:“官为吾仇,所遇必杀”,“凡遇作宦者必收拾(意指惩治)”!这种思想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成为激怒起义的重要原因。可是,打倒贪官,只能代表一个方面;“旧主慈仁”,将会顾全清廷的统治。联语和“顺天灭满”的思想颇多抵触,不足以表现起义军的政治纲领。下联宗旨明确:“新君多智慧,全凭雄兵猛将,扫平一十七省山河”。宣言依靠农民武装扫荡天下,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既有群众的“新君”,必然要取代清朝的“旧主”;夺取基业必有斗争,斗争“全凭”暴力,力量来自“雄兵猛将”广大人民;“扫平”全国,改天换地,重振山河。整个运动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争取实现“顺天灭满”的革命理想。以较上联,彼自逊色。

其次是蓝李与石达开的关系辨误。

蓝李起义初期,正当石达开从广西入蜀,转战川南的阶段。近代论著好为牵附两军关系,俱非事实。石军行踪的原始记录,载入四川督署的档案,《湘军志·援川陕篇》作了较有系统的整理。初稿名《援蜀篇》,写于光绪六年六至八月,以采访未集而罢;次年七月,闻始末于薛丹庭,续成全文。文稿是在成都写的,大多采用川督档卷,系事年月与骆秉章奏稿相符。纵不能视为石军和蓝李情况的真实记载,但所记两军的行迹日程,较之后来方志杂记当更可靠。兹据“湘志”,参用“骆奏”,对照两军行程,以资复核,所谓蓝李对石军的从属关系,自得真象大白。

第一、旧传蓝李军曾受石部节制的问题。咸丰九年(1859)九月,蓝李军自滇入蜀,连破筠连高县等城,两道进取叙州。明年正月,蓝李分往五通桥和自流井,分部出攻川西南各地,年内横行三十州县,附省百里地区皆在义军控制之内,川东沸腾。十一年(1861)蓝驻绵州,李驻眉州,雄峙南北,分兵四出,解放四十余州县;李部周绍勇一支入驻川东。清兵并力“围剿”,八月蓝朝鼎退移丹稜,十月初李永和退移青神。十一月二顺朝鼎战死,大顺朝柱率师入江油,继转移川东开辟阵地;永和亦移主力于犍为铁山。这个时期,蓝李起义正处于发展阶段,石军还未进川。

咸丰十年(1860)九月,“达开自广西还,出沅靖边,将入蜀,两湖相惊。沿湖南贵州四川湖北界北上,崎岖闯行五省。屯军惮其名,蜀尤震动”。石欲入蜀,须绕道湘黔,两军间隔渺不相涉。《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五蓝李两传中,却捏造了他们对石的依附关系。《蓝大顺传》云:太平八(当作九)年,蓝李自滇渡江,进围叙州,“时石达开前锋将入蜀。大顺与短搭谋,遣使如达开军,愿受款听约束,自名为滇蜀太平军统领。”蓝李渡江在达开西征之前一年,传文谓“遣使如达开军”,时间自有矛盾。所谓石军

“前锋将入蜀”，本来就是虚传之事，也在蓝李渡江以后。如按川南传说，咸丰十一年八月，有号称石军前队的队伍，最先攻入黔江，更在蓝李进围叙州以后二年。“遣使”之说，与前后时间俱有矛盾。《李短搭传》又云：“大顺欲自主为王，北走自流井”，李即劝之归石，“乃遣使如达开军，愿听节制。达开命分其军为二，大顺率一军自叙州趋自流，短搭沿金沙江趋犍为。”当时石达开尚在广西，遥隔数省，进退未决。蓝李起义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什么必须充当石部的一个支队统领，讨封受职受其约束才能举事？蓝李入川后，根据形势发展分兵出击，石又岂能远在数千里外，盲目指挥“分其军为二”，这更是无知之谈。细审野史文句，显然是在抄录《湘军志》或《湘军记》之外，增入臆造的情节，以夸张石军的声势。野史撰述，本无意于认真考载史实，特以异闻为尚。其书固不足道，而影响却甚深远。《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十五章说：咸丰十年三月，蓝向石联系，自称“川滇太平军总领”。其来源明明出自野史，唯稍改动时间和职号。这时达开仍在广西入蜀途中，蓝李已攻取川西南数十州县。今被处置为石部的一名总领，无非欲为达开宣扬神威，而不惜贬低蓝李军的独立地位。

第二、关于蓝李应接达开入蜀和奉命攻取长宁等事的真象。旧传其事，实出附会。但须排比两军的详程，作伪之处，自露马脚。《湘军志》载：同治元年（1862）正月，达开方屯来凤，窥涪夔；川东别部周绍勇驻涪州鹤游坪。二月大顺出新宁（今开江），南走垫江丰都；达开破石柱。三部相去各百里，然不能相响应，石游骑西至涪巴南岸不得渡。（案骆奏《石逆逼近川疆疏》：正月初五日来凤，前队已至利川。又《垫江解围疏》：二月石由利川破石柱，不得渡江，沿南岸至涪州小河。三月四日围涪州，十三日走藿市攻綦江。）四月达开经南川出境，过綦江留攻城一日，南走贵州仁怀，西入叙永，西北走兴文珙庆符高，东还陷长宁。（案《綦江解围进攻长宁疏》：石自涪州退出，十一日攻綦江，败走仁怀，出叙永走兴文。二十八日破长宁，分攻高珙庆符。五月败走，二十二日还长宁。）以上备举石军入蜀过程，给人的印象是：石挟数十万众远来，初欲占踞涪夔，展转于綦江叙永间，困蹙一隅。此时，蓝李军刚经受几次较大的挫折，处于流动阶段。大顺远走川东，于是年正月取新宁，二月走垫江丰都，三月出忠万云阳，四月北上开县太平（今万源，并见《克复新宁》《克复太平》二疏），五月至陕西定远所。永和于三月在铁山突围，移师泸富间的天洋坪，四月再移宜宾八角寨，蓝李两部各在一方。

当二月初，蓝军下丰都时，周绍勇部仍在鹤坪，恰遇石军破石柱，三部“相去各百里”。骆秉章以重兵防守重庆涪陵，使三处“不能相响应”。如果说蓝军和石部在客观上能声势相援，互通气息，便在这个时机。野史却又过甚其词，谓李“别遣一军（周）屯涪州鹤游坪响应达开”。按去年初李在眉山时，即分派周绍勇等部开拓川东，转攻资渝泸属，北上璧山大竹，聚兵南充广安（见《调刘岳昭入川片》），原无固定的目的，九月才进驻鹤坪作为根据地。野史附会为响应石军入川，专门留此等待，对周的行军部署，有所窜改。《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又说：同治元年端王蓝大顺“自四川涪州（？）趋丰都，谋接应翼王石达开”。按端王是太平军在陕西的将领之一蓝成春，此误为蓝大顺所受封爵，混为一人。更把蓝军北上东移新的部署，全部纳入石军的活动计划。且看，大顺去年从江油问道赴川东，今年春与张第才等部合取新宁，出走垫江丰都忠万云

阳，北上开县太平入陕西，如此纵横千里，驰骋西东，岂是为了“接应”石军。达开出没川鄂，自己也算不定在那里立足，蓝周两军就能料定他要攻下石柱，真是奇闻。

石军一度取得长宁之事，更被用来强附蓝李的关系，大做文章。《湘军记》谓：“时川匪围江安……川匪与石党合陷长宁”。所谓川“匪”，当即《云南捐务仍设泸州片》中所指的李永和川南别部张正洲军：“其张逆股匪无多，已投入发逆夥内”；则正洲一支后来确已投归石部。所谓石党，当即《石达开自述》中所指：出涪州后，“头队唐姓杨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则唐日荣杨荣富是与当地的张正洲同取长宁。野史《蓝传》却说成是大顺奉达开之令，效力夺城，败后又惊惶远遁云：“太平十一年（当作十二年，即同治元年）达开军入叙永，大顺约短搭如军谒达开，自居于部将，执礼甚恭。达开益大顺军，命攻长宁克之。清将刘岳昭令唐炯并力击破大顺军，复长宁。大顺遂走陕西定远，破洋县佛平踞之。”这段记叙颠倒错乱，尤其荒谬。石军四月取长宁时，大顺已由太平北上定远（见《克复太平余贼遁入陕西疏》），南北远离，清兵间阻，怎能谒达开于叙永，更说不上受令取城了。野史叙湘军刘岳昭等夺去长宁后，蓝才败入陕西，更非事实。《湘军志》载刘岳昭唐炯等“皆持寇长宁”，知石军得城非止数日。据《进攻长宁疏》说，石是四月廿八得城；《攻克长宁疏》说，石是六月十六失城。显见野史是把大顺入陕西的时间，故意推迟在长宁之败后，弄笔欺人。野史在《李传》中同样地虚造情节，谓李“入宜宾，分屯其军于天洋八角砦，而自将劲旅赴江安会大顺，同如叙永谒达开。与达开军合克长宁，已而还八角砦”。石军取长宁前，正被清兵追击，流奔川黔之间。时永和在天洋坪奋战清兵，四月十五退到八角寨，准备再战（详《围攻李逆疏》），五月十九清兵即围大寨（详《攻克八角寨疏》）。他能不顾紧张战局，抛下大队，赴江安转叙永去朝拜石达开，攻打长宁城吗？这年内蓝大顺既未到过涪州，更没有去过江安。事实是：江安驻军为张正洲部，野史混为大顺；正洲与石军前队共取长宁，野史指为蓝李奉命“合克长宁”，全是张冠李戴。如因人物地址不详，臆测“川匪与石党”为蓝李与石的关系，其谬误尚可原谅；但影响却甚恶劣，后人即据以伪造文件，定为铁案，证成其事。

第三、证明蓝李与石部发生直接联系的唯一材料是《傅佐廷等致李短鞞蓝大顺书》，此件原属伪品。书托名于石部五天豫会衔覆谕蓝李，因“恳请同为合兵等情”，训示二人“照旧驻扎等候，毋容前来叙永等处迎接”，俟石至后，再定行为。末署“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初捌日”，即同治元年石正败退贵州尚未取得长宁之时，永和亦驻军宜宾，时间地望似无不合。据转抄文件人题记：“廿九年（1940）七月见此两纸装裱于成都诗婢家，因亟录之。”抗战期中，四川历史文物空前行销，伪造膺品无奇不有。原件在成都装裱时，即被人指出函首行款可疑，书云“海谕李短鞞、蓝大顺二位贤第等知悉”，太无常识。蓝李各有本名而不用，呼蓝为大顺尚属军中习称，称李为“短搭”却是他的绰号，书作“短鞞”更是清方文书例用的辱词。如骆秉章奏疏中，凡义军诸将名字皆加犬旁，或改吉祥字义为同音凶恶字样。五天豫正式移文蓝李，何致承袭此类反动谥词，称为“鞞”逆，岂不可笑。况且石部以客军入川，蓝李声威远出五天豫之上，他竟公然对蓝李下发训令，“特此海谕，遵照无违”，理不可解。在太平天国的文件中，亦无

例可循。弄虚作假的人，如果不是凭空编撰，其伪造信件的依据，无非是野史所载蓝李敬谒石王于叙永、愿受节制等诬词。此件一经传钞转载，便成信史；原书尚存，习视为珍贵文献。好异搜奇，不加抉择，必将歪曲史实。

第四、继长宁事后，两军仍不相干，更无联系。李永和于七月半至八月中激战八角寨，移驻犍为龙孔场，闰八月底牺牲，义军五千同日被屠。周绍勇出师援李，战移川北，九月底在大竹县东被俘，不屈而死。大顺在陕西夺取洋县山阳诸地，川中蓝李各部都转到陕南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蓝李各部转移后，石以孤军挣扎，渐向末路。自六月中败出长宁，走兴文回叙永围永宁（见《攻克长宁疏》）。七月分兵往江津，欲回攻渝涪，八月一日攻江津，二日败退綦江东溪。闰八月与赖裕新李福猷分三旅大举入黔，清兵追之，由黔西普安入云南镇雄。九月复自滇入川，攻占叙州横江场，下旬取筠连；十月一日破高县，旋失回横江（并见《石逆回窜疏》）。十一月中败出横江，经双龙场、燕子滩渡河入云南，下东川（见《攻克逆贼坚果疏》）。明年（1863）正月拟分三路入川，石率前旗于二月中由昭通米粮坝渡江出宁远（西昌），三月北走，困于越西，四月即在石绵作了降囚被杀。计石军自入川东，久困川南，终覆灭于川西，此两年内，唯在石柱一带时，能与蓝李起到互相援应的作用，其余影响之谈，尽出虚造。

第五、附说起义的纪年，不应始于咸丰八年。《唐友耕年谱》记其未叛变降清前，与蓝李结盟共事，随军入蜀云：咸丰八年，“川滇之边盗贼蜂起”；九年“蜀边寇首为蓝大顺李永和”。前者实指起义前夕的形势，后者才确指正式起义。年谱附录《唐友耕战绩清摺》亦云：“咸丰九年蓝大顺李永和大股窜扰川境。”《蒙寇志略》则谓：“咸丰八年，滇匪李蓝各逆窜入蜀境，大肆猖獗”，围攻叙州，明出误记。《太平天国野史》记大顺劫狱起义，围攻叙州，皆抄自《湘军志》文，却改系于太平八年（即咸丰八年）；又系永和围攻叙州，进驻自犍为等事，亦在八年，并同起义时期提前了一年。及记顺庆绵州丹稜诸役，又系于太平九年，则更提前了两年。其纪年错乱，于首义岁月尚且如此，其它可以想见。

再次是蓝李军与中旗和花旗等部的关系。

蓝李军蹶起滇蜀，纵横六省，当时西北诸军并作，蓝李也不能排斥能够合作的友军。达开余部和蓝李军正式联合作战的，唯有中旗部队。这支队伍在石死后，坚持战斗，成为蓝李军后期的坚强同盟。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达开败出叙州横江场，“旋复退入滇境，而谲谋未息。以中旗赖裕新一股（万人）先自宁远冒险内窜，以伪宰相李福猷一股（三万人）仍由黔境下趋（绕入四川），以图牵缀大兵，而自率大队由滇之米粮坝境踵渡金沙江”（见《石逆被擒疏》）。按此计划，中旗分兵先出，于次年正月下旬渡江，至宁远之河西。二月初经冕山至越西，拟由峨眉嘉定往叙州，应接达开大队渡江攻成都。裕新在越西阵亡后，唐日荣杨荣富率领中旗于月中渡河，北走荣经天全，三月穿过川西腹部到达广元，十八日由平武入甘肃文县（见《中旗自宁远上窜疏》。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彝族近现代

史调查资料选》谓赖部入川时间为上年十二月，乃得自当地群众的回忆，不知确否）。大顺军早在元年五月已进入陕西，即与太平军配合作战。明年中旗继至，与大顺军长期联合战斗，事迹可考。

大顺初到陕南时，太平军陈玉成派出的扶王陈得才部已从河南进入陕西。四月“粤将陈得才捻军入武关，窥省城，陷渭南，西安戒严”（见《湘军记》），继与蓝军共取镇安。稍后，从川东鹤坪周绍勇部派出的郭福贵一支人马，“分党出梁山垫江，掠达陷开，（七月初）从城口出陕境，陷平利汉南”（见《湘军志》及《滇匪分股奔窜陕境疏》）。二十日取竹谿竹山，捻军也准备由荆紫关至郟阳与郭合兵攻兴安。八月郭部复回陕西，与洋县大顺大队会师。（当时盛传石达开部队到了陕楚边境，清廷特下诏讯问，见《石逆不能窜郟阳片》。但在《平定粤寇纪略》等书中，仍称打到湖北的部队是“石达开党贼”或“石达开一股”，混误郭福贵为石军。）蓝郭两部复与太平军并肩作战，九月“前后入陕二部合陕豫群盗掠洋凤文阶边”，十月得才“合川陕盗纵横兴安汉中”。蓝李军在陕西与太平军捻军结成广大的同盟，把斗争形势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及到中旗北上后，范立川“川翼王旗屯定军山”，与蓝李军取得联系。《湘军志》谓大顺“合石寇中旗，驰突褒沔陇秦界中”，正在这个时候。三年（1864）二月，蓝军失周至（去年六月取得），朝柱阵亡。由前分驻城固的蓝二顺蔡昌龄总领全军，三月曾谋与太平军启王梁成富及中旗联军入川。五月蔡、启合攻西安取郟县，及七月失郟县时，清兵“收郑永和等五千余人。郑永和者，伪翼王余党所谓中旗者也”（见《湘军记》）。可见这段战斗，中旗仍在一起活动，共与始终。蔡、启率师走略阳入阶州，十一月清兵攻阶州蔡、启联军，明年五月牺牲。蓝李军进入陕西整整三年，与中旗和太平军的关系最为明确。李秀成供词举出，“川豫东三省之匪皆通发逆”，指的便是蓝李军和捻军。中旗这支坚强的队伍，久经战火考验，不愧为太平军中一支异军。

在蓝李的统一领导下，还有一支特别组织的队伍，即骆秉章奏稿中屡次提到的“花旗”，过去一直被忽视了。《进剿眉州李逆大胜疏》谓：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兵攻眉州李部时，蓝“复遣花旗贼三四千，马队数百匹，由丹稜来与合并”。又《克复新宁并解垫江围疏》谓：同治元年二月，当朝柱军出新宁时，李军在犍为铁山抗击清兵，部队中的一支“飏出五色花旗，约二千余众来扑。”奏疏明言蓝李两军并有花旗，部伍俨然，自成一个战斗单位，决非旗色偶异。石达开在江西，曾吸收天地会入太平军，允其不经改编，自成“花旗”（译《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但咸丰十一年石军犹未进川，不可能是由他带来才转入蓝李军中，应是蓝李军中固有的一个组织。咸丰元年清廷曾下令川督，命搜捕远布教徒于湖南等省的峨眉“万云龙”。由此透露一点痕迹，天地会曾在四川秘密发展，并仍然托名以万云龙为首；及至蓝李起义，集体参加了义军行列。更有意义的是，百多年来，社会生活中还能发现天地会遗留的影响。《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记载：天地会“木杨城”的陈设图里，在忠义堂关羽像的右方，贴有一幅符篆。过去四川流行的民谣中，正有一首歌唱这张符形的谣词。花旗随蓝李大军往来两川，其符篆亦因之广布民间，于是依照符形，编成韵语，暗寓“斩七”为誓，武装暴动之意。经时既久，符篆渐已成为壁饰图案，虽不悉其来历所自，而歌词仍在传唱，

流传不绝。

咸同间，滇西曾出现杜文秀利用民族矛盾而建立的平南政权；蓝李与杜都起于滇境，有时也被并称。如《彝军纪略·中兴名臣叙赞》云：“其后发逆分党，扰云贵四川，而杜马、蓝李与倡和”。骆秉章于同治四年《统筹滇黔用兵缓急疏》中，亦以蓝李与杜并举，谓先平阶州，然后灭杜。凡此用语，皆因类而及，由此及彼，本不足说明二者的必然关系。后人撰《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谓：“又派蓝大顺带兵入川，略取川陕”。竟以蓝李兴师，是从平南派出。这同样是缺少根据的无稽之词，企图把这场席卷川陕的革命洪流，说成平南派生的余波，自属荒唐万分。

清代官场倾轧，不择手段，居然也利用蓝李事件，加以窜改，作为互相攻击报复的工具。《逆党祸蜀记》载：咸丰四年九月，南溪县九千岁王心一，泸州开国大将军李三等二千余人，酝酿未遂的一场暴动，事露被捕。川督黄宗汉为保纱帽，不敢公开张扬此事，暗中释放了被捕的十余人。原永宁道办案人汪坤不甘承错，又怕将来翻案，连累得罪，因录全案成书，以自表白。并附会蓝李起义就是泸州旧案的延续，胡说什么数年之后，李三连得七十余城，“其分股窜入邻省者，一由川北逸入陕西，一由川南流入云贵”，全是谎言。其存意指认李永和为泸州李三，别有用心一望而知。

蓝李起义事隔数年，便已附会传闻，无怪百年之后，异说纷歧。翳蔽史实，有待澄清。

最后是有有关蓝李军制的问题。

或因蓝李曾受石军封号的传说，乃谓蓝李军队亦按石军的体制编成。达开出京后，军制何如，不得而详。蓝李军的组织制度，亦从无记载，只能就清方文件中得其一鳞一爪，看出一个轮廓。它与太平军的编制固有相同之处，却难推断是按石部的体制编整组织。蓝李军一贯实行军政合一的四级编制，领导核心都称元帅，其下为都统、统领、百长三级。从各大战役中，参比诸将职位，略能考见全军组织情况。骆奏《声明蓝朝鼎非蓝二顺片》云：全军“设伪都统分辖，伪都统皆昭通人；伪统领以下，始杂用川人。”可知元帅之下的将领有都统、统领两级，都统是最早参加起义的高级将官，统领属于中层。太平军亦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四级，中旗组织也是元帅、旗帅、统领等四级。但蓝李军同级的称号，却又因时而异。

“绵州之役”所见元帅三人（元帅蓝朝鼎，前军付帅蓝朝柱，前营付帅碧洪发）。都统十余员，各率七八千人，职称颇为参差（如兴义军、青龙军、仁军、水军、六合营、左右营等都统，当属前军或前营付帅所领；左帅营、左军、左营等都统，当属左军付帅所领；右中营、右头军、右七八九营等都统，当属右军付帅所领）。各都统既分属前军、左军、右军诸付帅，是否还有后军付帅，未见材料。都统下则有前锋统领等号，凡统领若干员，属第三级。

“顺庆之役”总镇何国梁率师一面，应相当于付帅，下为都统，再下为统领、参将、参谋一级，与绵州大军相同。又“崇庆之役”为将军、都统、千总三级，千总应与统领同级，率兵千人，高于百长。士卒编制，以百长率百人，为基层战斗组织（见后文）；统

领约率千人，故同千总；都统率七八千人，位次于帅。凡独当一面的总镇或将军，有时也称为帅。《艺风堂文集·书杨爽泉大令逸事》谓：蓝李军“大小数十股”，在夹江的“凡大股薄城者三，伪帅段启贤段启智骁将也”，其职位实同于顺庆的何国梁。大顺朝柱自丹稜北上时，军中也有统领、参谋的职称，参将、参谋或与统领同属第三级。及到汉南定远时，在大顺至四顺四个帅主之下，有都统孟姓为昭通人，先锋李姓犍为人，巡捕詹姓已入营四年，为蓝二帅蔡昌龄的亲信，三职皆属同级。

李永和“眉州之役”及“天洋坪之役”军职较多，表明李部的领导机构，比之绵州军的组织似更完备。高级的将领有“帅主”张裕仁刘孝昌温如玉碧洪发卯得兴数人及“大都督”周庭光等，并有“将军”“都督”“监军”等号；或称帅主，或称都督、大都督，或称将军，都是同级（太平军的将军、总制、监军皆在军帅之上，与此不同）。又有“左护国政司”何崇政及“通政”等称，应为高级文职，都属于领导职位。次一级仍称“都统”，并有先锋、巡部、督统多人（见龙孔场之役），应为同级；再下为“统领”。以上三级职称时有变易，基本相同。唯“鹤游坪之役”所记略异：周绍勇出镇一方，当是帅主；其下却为统领曹灿章及中营统领、右翼统领、前营统领等；再下有都统168人被俘，最下便是百长。若按上举诸役的编制，曹灿章等人应是都统，曹军本来就是—支大队；被俘百人之多应是统领，疑骆奏故将二者倒置用以夸功。此役所载有“百长”一级，因知蓝李军组织，在统领或千总之下，还有基层的百长，共为四级。

大顺军进入陕西后，重建政权，首领称“天汉显王”，并置诸王，下属都护、巡捕、先锋等职（详重修《镇安县志》卷十兵事）。此时增置王位，即原帅主。“蓝氏兄弟（按指领导组织）三十六人，唯蓝四以上称帅主”，大顺蓝朝柱、二顺蔡昌龄同是帅主，与诸王组成领导集团。都护当是原来的都统的改称，巡捕即原有的巡部，军中“各营头目及帅营巡捕始称大人”。巡捕专掌帅营巡查各部之职，位与都统同级。蔡昌龄在阶州时的组织，与此略同。蔡为元帅号昭武王，并有蔡三蔡四以至蔡九帅（见《会剿阶州获胜疏》）。蔡氏九帅犹蓝大顺至四顺，皆为尊号，实非本名。王位之外有冲天侯曾广道、听天侯夏起顺等，也是各帅的封号。其下有东中营都统、巡部、先锋，再下为统领、守备，最下为棚头。棚头属于百长一类的军职，仍为四级编制。蓝李军采用四级军制，虽与太平军和中旗大体相同，却无从证明是按石达开的军制组成。